

※特載※

回顧歷史：清朝統治下的內蒙古

沙拉德·索尼\* (印度)

藍美華 譯

〔本會現況研究委員〕

今日人們所知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蒙古自治區，人口總數為 2,384 萬，<sup>1</sup>人口上遠高於獨立蒙古國（昔稱外蒙古）的約略 240 萬人口（根據 2000 年蒙古的戶口調查）。同樣地，由於位居中國北境戰略位置，東接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南及西南接河北、山西、陝西各省與寧夏回族自治區，西接甘肅省，北及東北分別與蒙古、俄羅斯接壤，內蒙古在地理上有其重要性。因此之故，一個封閉的省份很特別地在 1947 年成為中國第一個自治區，其後另有廣西壯族、新疆維吾爾、寧夏回族以及西藏等四個自治區。數十年來，內蒙古走過一大段路，目前已經在中國政府社經與政治的區域發展政策上享有重要地位。驚人的是，在後冷戰時期，由於中俄及中蒙關係的改善，內蒙古目睹繁榮邊境貿易的大幅進展，此一事實也顯示了內蒙古自治區作為政治地理單位的重要性。不過，內蒙古是在滿人佔領中國、建立清朝統治（1644-1911）後才開始成為一個政治地理單位。

本論文即在此脈絡下檢視內蒙古歷史，追尋其根源，這與蒙元在中

---

\*沙拉德·索尼 (Sharad K. Soni) 博士為印度新德里尼赫魯大學國際研究學院中亞研究部門的蒙古研究副教授，其聯絡電子信箱為 sharadksoni@gmail.com。

<sup>1</sup> 此為 2004 年估計數字。然而，根據 2000 年中國人口調查，內蒙古人口總數為 2,376 萬，其中蒙古人幾近 400 萬。參見“Inner Mongol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ner\\_Mongolia](http://en.wikipedia.org/wiki/Inner_Mongolia)。

國被推翻後蒙古分裂有相當關連。本論文除了仔細審查清朝對內蒙古的政策外，也強調蒙古人被滿人征服後區分為內蒙古與外蒙古一事。<sup>2</sup>

## 蒙古帝國的分裂

有歷史研究指出，直至十三世紀成吉思汗統一所有的蒙古游牧部族、建立大蒙古國（*yeke mongghol ulus*）之前，內蒙古乃是陽剛有力的蒙古游牧民突襲掠奪務農的漢人的基地。<sup>3</sup> 擁有領袖特質的成吉思汗對蒙古帝國的擴展貢獻卓著，在他 1227 年去世之前已經「藉由征服中亞內圈區域」建立了「遼闊的歐亞帝國的基礎」。<sup>4</sup> 結果，成吉思汗與其繼任者所統治的蒙古帝國涵蓋了東到太平洋岸、西到亞得里亞海、北到西伯利亞、南到東南亞的廣闊地區。令人驚訝地出現如此龐大的帝國建立是因為「不同於以往的游牧民族入侵定居區域，蒙古人的崛起是突然且壯觀的」。<sup>5</sup> 儘管如此，蒙古征服中國所顯現的非凡卓越，不僅因為整個中國都被置於蒙古統治，而且從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時期起，中國成為帝國統治的發號施令之處。<sup>6</sup> 1280 年，當宋朝滅亡、中國南部加入忽必烈的元朝後，整個中國被併入大蒙古國。忽必烈的元朝不僅見證到與亞洲、歐洲更為接近，更標示著俄國人與中國人的開始接觸，是目前所知

---

<sup>2</sup> Chang Yin-T'a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of Inner Mongolia*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3), p. 57.

<sup>3</sup> 有關蒙古人的崛起及其征服，參見 Sharad K. Soni, *Mongolia-Russia Relations: Kiakhta to Vladivostok* (Delhi: Shipra and MAKAIAS, 2002), pp. 13-16。

<sup>4</sup> John K.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Delhi: World View Publications, 1998), revd. Edn, p. 164.

<sup>5</sup> 參見 Stephen Kotkin, "Defining Territories and Empires: from Mongol Ulus to Russian Siberia, 1200-1800," [http://src\\_home.slav.hokudai.ac.jp/sympo/proceed97/kotkin.htm](http://src_home.slav.hokudai.ac.jp/sympo/proceed97/kotkin.htm)。

<sup>6</sup> 關於蒙古與中國的早期接觸，參見 Sharad K. Soni, *Mongolia-China Relation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imes* (New Delhi: Pentagons, 2006), pp. 1-18.

歷史上這兩個民族間初次的接觸。<sup>7</sup> 因此，整個十三世紀是個獨特的時代，當時蒙古人在歐亞大陸扮演了一個關鍵的作威作福的角色。

儘管如此，忽必烈在 1297 年的逝世可視為蒙古統治中國歷史上的轉捩點。他的繼承人欠缺統治元代中國如此廣大領土的能力，因此蒙古在中國的統治轉弱，由 1368 年建立的明朝取而代之。到了十四世紀末葉，當其他汗國—即察合台、波斯及欽察（金帳）—也無法維持而分裂為若干王國時，作為一個統一實體的大蒙古國面臨嚴厲的打擊。<sup>8</sup> 然而，蒙古人多次努力、企圖恢復失去的領土並重新踏入世界舞台，但並未成功，主要是由於他們捲入權力鬥爭引發的兄弟鬩牆戰爭。真正標示蒙古征服時代結束的是綽號跛子的帖木兒（1336-1405）的興起。<sup>9</sup> 在後元時代，明代中國與蒙古人的關係可以從明朝統治者所追求的政策來描述，他們著重的「並非征服整個蒙古，而是摧毀帶給他們驚人力量的部族的統一」。<sup>10</sup> 事實上，是明朝的「分而治之」政策讓漢人得以將南蒙古（現今內蒙古地區）的半游牧民納為盟友，用以對付北蒙古地區（今日的蒙古）完全游牧機動的部族。<sup>11</sup>

一段時間之後，當明朝統治者不再懷恨蒙古人，一些在明人驅除其汗王時無法回歸故土的蒙古人被允許留在中國原居地。其後，當某些蒙古人讓自己過著漢人般的生活或至少融入中國治理制度，如何平靖一大群尤其是居住在中國邊界外的人仍是一個難題。羅薩比（M. Rossabi）認

---

<sup>7</sup> 參見Soni (2002)，前揭書，p. 15。

<sup>8</sup> 同前註，p. 16。

<sup>9</sup> J. J. Saunders, *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Kegan] Paul, 1971), p. 173.

<sup>10</sup> Fairbank and others (1998)，前揭書，p. 200。

<sup>11</sup> 同前註。

為，原因是「……〔由於〕蒙古人是散居且分為這麼多的部族，想平定所有這些群體是不切實際的。而且，明代蒙古人很少與中國進行大規模的交戰。小群軍隊在與明朝軍隊相遇時，多是採取打了就跑的戰術，或可稱為游擊戰……」<sup>12</sup> 蒙古人所採用的這類戰術反映其政治組織的普遍狀況，與以往不同，他們已無共同的領袖來統御。由於兄弟鬩牆，蒙古人必須付出沉重代價，蒙古新帝國的崛起只能是一個夢想。這再次導致不同蒙古部族的分裂，到十五世紀初期分為兩部分：東部與西部（或衛拉特）。東蒙古包括喀爾喀、布里雅特、察哈爾和土默特，西蒙古則包括杜爾伯特、衛拉特和厄魯特（Olets）。

其後，在十七世紀，東蒙古也分裂為戈壁以北的北蒙古（喀爾喀、布里雅特）和戈壁以南的南蒙古（察哈爾、土默特）。<sup>13</sup> 蒙古人這樣的分裂導致其領域一步步地被滿人與俄國人征服，後二者開始主控內陸亞細亞地區的地理政治。北蒙古方面，喀爾喀在十七世紀結束前降服於中國的滿清統治，而布里雅特則遭俄國人征服，在政治上與喀爾喀分離。從此之後，北蒙古的喀爾喀人也開始被稱作外蒙古人，即今日蒙古的居民，而南蒙古人被稱為內蒙古人，即現在中國內蒙古自治區的居民。這也顯示，由於內蒙古王公與滿清統治者合作較深，而被視為內圈之人；而北蒙古的王公則因抗拒較久而被視為外圍之人。<sup>14</sup>

回到明代，我們注意到，在蒙古人分裂後，明朝皇帝開始對東西蒙古採取分化挑撥的手法，主要以西蒙古來對付東蒙古。但這一手法運作

---

<sup>12</sup> Morris Rossabi, "The Ming and Inner Asia," in Denis Twitchett, Frederic W. Mote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8, Part-II, 1998, pp. 225-6.

<sup>13</sup> Peter S. H. Tang, *Russian and Soviet Policy in Manchuria and Outer Mongolia, 1911-1931*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76.

<sup>14</sup> Tsedendambyn Batbayar and Sharad K. Soni, *Modern Mongolia: A Concise History* (New Delhi: Pentagon Press, 2007), p. 8.

並不恰當，在蒙古政治發展中—尤其是 1423 年至 1530 年期間—扮演主要角色的衛拉特人（西蒙古人）甚至擴張至可以反抗明朝的程度。<sup>15</sup> 舉例來說，皇家子弟巴圖蒙克（Batu Möngke, 1470-1544），即熟知的達延汗，初次企圖統一蒙古各部—包括東西（衛拉特）蒙古—於其領導之下。據說他懷有雄心，與其先祖一樣，希望「在中國重建蒙古統治」。<sup>16</sup> 然而，分裂與兩敗俱傷的持續戰爭弄垮蒙古人，對中國有利，以致於達延汗「在位的最後三十年不能再威脅明帝國的生存」。<sup>17</sup> 自此之後，蒙古地區多多少少成為以自己為名的獨立王國，其統治者採用「汗」的頭銜。<sup>18</sup>

統治整個蒙古的最後一位大汗是達延汗的孫子、土默特的俺答汗（阿勒坦汗，1532-1582），他建立了現代內蒙古的首都呼和浩特城。俺答汗在明代最後一次企圖統一蒙古，<sup>19</sup> 也有能力對中國邊境地區造成巨大壓力。在俺答汗時期，蒙古侵襲中國領土的原因也來自於對朝貢及貿易特權的爭執。1551 年開始，當他要求明朝皇帝接受的條件被拒絕時，即展開一連串毀滅性的襲擊；直到幾乎 20 年後蒙古的襲擊才告終，於 1571 年取得和解。<sup>20</sup> 藉著為蒙古與明朝僵局帶來和平的和解行為，內蒙古西部的蒙古人得以稍獲平靜，讓中國可以把注意力轉到該區域的東部（滿洲的西部）。但在這部份，蒙古王公持續不願妥協，使得在 1582 年俺答汗過

---

<sup>15</sup> O. Edmund Clubb, *China and Russia: The Great Game*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6-7.

<sup>16</sup> 引自 Morris Rossabi, *China and Inner Asia: 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5), p. 45.

<sup>17</sup> 同前註。

<sup>18</sup> David Sneath, *Changing Inner Mongolia: Pastoral Mongolian Society and the Chinese St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7.

<sup>19</sup> 參見 Morris Rossabi, "Altan Khan," in Ainslie Embree, ed., *Encyclopedia of Asian History* (New York, 1987), vol. I, p. 50.

<sup>20</sup> Rossabi (1988), 前揭書, p. 237。

世後情況更加惡化。蒙古人終於變成無組織的流浪部族鬆散的集合體，彼此爭戰，偶而侵襲中國，直到滿人興起才終於收服蒙古人。

### 蒙古人被滿人征服

早在 1644 年滿洲皇帝首次以清朝統治者身分在北京登上龍椅之前，滿人的興起對蒙古人的命運即造成巨大影響。通古斯族的滿人原屬於游牧的女真，住在今日的滿洲地區，在十六世紀末葉出現在舞台上，對明朝帶來確切的打擊。幾年之後的 1619 年，滿人領袖努爾哈齊（1559-1626）對明朝極度困擾，因為後者介入滿洲部族事務、甚至成功地把葉赫氏從他手下拉走。<sup>21</sup> 為了重新掌控葉赫氏，並且給明朝中國一個教訓，他設法從「西南五喀爾喀」這個強大的蒙古聯盟尋求所需要的協助。在他寫給此蒙古聯盟王公的信中，努爾哈齊強調蒙古與滿洲間的「文化認同」，試圖爭取他們，並鼓動他們援助對明朝中國的戰役。<sup>22</sup> 終於，藉由他們的協助，努爾哈齊發動對明朝軍隊的攻擊，在 1621 年 5 月控制了明朝的重要城市遼陽與瀋陽。

1624 年，滿洲的另一個蒙古部族科爾沁也與滿人結盟。所有這些發展激勵努爾哈齊於 1625 年將首都移到瀋陽，鞏固了滿人進一步爭奪北京王位的力量。然而，努爾哈齊並未活著看見北京成為滿人權力的所在，因為他在 1626 年與明軍作戰中受傷死亡，這也是他生命中首次較大的挫敗。儘管如此，在努爾哈齊過世時，滿人已經發展出組織嚴謹的國家，

---

<sup>21</sup> David M. 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Manchu's Mongolian Policy,"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98. 在 1613 年之前，除了藉由明朝軍隊之助而能抵抗的葉赫氏外，努爾哈齊已經征服所有女真部族。

<sup>22</sup> 同前註，p. 199。

在政治與軍事上均已成熟，足以讓他的兒子與繼承人皇太極（1592-1643）擔負起父親半路留下的任務。現在，這個任務需要沒有阻礙地往前行，如果沒有征服西方邊界—東蒙古人的家鄉—上的蒙古人是不可能達成的。早在 1620 年代當滿人對中國的攻擊急劇升高，「蒙古分裂的過程也加速了」。<sup>23</sup> 這情況主要是由於滿人訴諸派系政治，誘使一群蒙古人去對付另一群蒙古人。即使被稱為最後一個蒙古汗的察哈爾林丹汗（1592-1634）也無法成功整合蒙古人。

俺答汗一去世，沿著長城的蒙古權力就從土默特轉到察哈爾手中，因此林丹汗也自認屬於成吉思汗皇家世系。滿人也清楚知道，沒能打敗林丹汗、征服東蒙古，是不可能前進中國內地的。因此，十七世紀初期，滿人在外交上致力於建立與東蒙古的聯盟，用以對抗林丹汗與中國。那時候，蒙古早已分為多個汗國及王國，沒有一個願意承認他人的領導，也沒有那個有能力可讓蒙古統一。即使林丹汗所屬的察哈爾人也開始背棄他、投向滿人一方。鮑敦（C. R. Bawden）正確觀察到：「現有的中國王朝〔明朝〕即將崩潰，被精力充沛的新政權〔清朝〕取代，這意味著林丹汗無法重建帝國權力一事使蒙古人步入危急時刻。」<sup>24</sup>

東蒙古內部的爭吵以及欠缺整合也導致南／內蒙古與北／外蒙古進一步的分裂。內蒙古人是滿人征討的對象，而外蒙古基本上維持中立，不把自己陷入內蒙古人反抗滿人征服的鬥爭中。終於在 1632 年，滿人在皇太極的領導下發動對內蒙古的強力攻擊。較弱的林丹汗軍隊無法抵抗滿人超出甚多的軍力，在 1634 年吃了大敗仗。<sup>25</sup> 但是，林丹汗帶著他的

---

<sup>23</sup> C. R. Bawden, *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8), p. 44.

<sup>24</sup> 同前註，p. 41。

<sup>25</sup> B. Shirendyb and others, eds., *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Moscow: Nauka Publishing House,

十萬人民逃向青海，即便他設法抵達當地，但在途中他已經損失了百分之八十的屬民。<sup>26</sup> 稍後他死於青海，也替從成吉思汗以來執政的蒙古大汗世系畫上句號。此後，「汗」的頭銜被眾多蒙古王公採用，而之前此頭銜僅限歐亞大陸蒙古四大汗國的統治者使用。<sup>27</sup> 征服內蒙古之後，滿人征服中國的主要障礙現在已經消除，在北京落入滿人手中之前，內蒙古已經牢牢受到滿人控制。

1636 這一年標示著滿人未來展望的轉捩點，特別是有兩個原因：一、皇太極宣稱自己為新的清朝的皇帝，二、在其即位大典中，內蒙古 16 旗 49 名王公推舉他為大汗（蒙文：Deed Erdemt，中文：天聰）。<sup>28</sup> 這些再加上軍事及行政能力讓皇太極成為北京帝位一個強而有力的競爭者，他也更有決心達成推翻明朝的任務。但他死於 1643 年，由他的兒子福臨繼承，後者於 1644 年 10 月 30 日在北京登基成為順治皇帝，中國第一個滿清皇帝。滿洲統治者由其前輩繼承而來的「分而治之」政策有效運作，使得滿人在內外蒙古均能維持其統治地位不變。在內蒙古方面，滿人將其組織成軍事儲備力，置於保護之下，並嚴格控制其政府。這一組織即是「內」蒙古制度與行政概念的來源，導致兩個蒙古差異甚大，而內蒙古與中國密切融合。雖然內外蒙古行政上的不同是在滿清時期正式引入，但其根源卻可追溯到更早，到十五世紀達延汗的時代。

另一方面，外蒙古與西蒙古間的部族戰爭持續到 1688 年噶爾丹（Galdan Boshigt，1651-1696）領導的西蒙古入侵外蒙古為止。為了反擊

---

1973), p. 171.

<sup>26</sup> 參見Baabar [Bar-Erdene Batbayar](1999), *Twentieth Century Mongolia*, C. Kaplons[k]i, ed., D. Sühjargalmaa, S. Burenbayar, H. Hulun and N. Tuya, trans. (Cambridge: The White Horse Press, 1999), p. 61.

<sup>27</sup> Clubb (1971), 前揭書, pp. 19-20。

<sup>28</sup> 參見Urgunge Onon and Derrick Pritchatt, *Asia's First Modern Revolution: Mongolia Proclaims its Independence in 1911* (Leiden: E. J. Brill, 1989), p. 2.



西蒙古人，外蒙古的喀爾喀王公向中國的滿洲統治者尋求軍事援助，<sup>29</sup>後者迅速回應，因為情勢正符合他們的擴張計劃。成功地征服西蒙古人後，滿洲康熙皇帝於 1691 年在內蒙古的多倫諾爾召集喀爾喀人會議，<sup>30</sup>會上喀爾喀王公承認滿洲皇帝為其大汗。但是，滿人與西蒙古人之間的鬥爭仍持續進行，直到 1750 年代滿人終於大敗西蒙古人為止。雖然西蒙古人的主要部份仍留在今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北部，其領土一部分併在外蒙古的西北部，他們在那邊彼此爭戰。結果，一群人分出來，移居到俄羅斯伏爾加河下游，也就是後來的喀爾瑪克人。<sup>31</sup> 征服西蒙古之後，儘管和內蒙古比較起來，在外蒙古行政上統治較為鬆散間接，但直到 1911 年，滿人一直統治著兩個蒙古—內蒙古與外蒙古。

### 清朝治理下的內蒙古

滿清可以將內蒙古緊密納入其治理與當地地理條件有關，因為該區域有利於讓滿人的控制拓展到其他蒙古人居住的地方。很明顯的，與內蒙古各部結盟是滿人得以興起的根本原因。有關滿洲皇帝與內蒙古各部互動最早的文件可追溯到 1636 年，其中承認了滿洲皇帝的宗主權，雖然也規定：「假如〔清〕王朝垮台，所有之前存在的法令將再次生效。」<sup>32</sup> 可是內蒙古從未再回到它之前的地位，更像是一個滿清中國的「省」而非單純的區域。<sup>33</sup> 看來，在剛開始被滿人打敗而征服的蒙古人最後既是屬

<sup>29</sup> 同前註，pp. 2-3。

<sup>30</sup> Tang (1959)，前揭書，p. 279。

<sup>31</sup> Owen Lattimore,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Mongolia* (Leiden: B. J. Brill, 1955), p. 7.

<sup>32</sup> 參見 G. M. Friters, *Outer Mongolia and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49), p. 151.

<sup>33</sup> Ken Shen Weigh, *Russo-Chinese Diplomacy: 1689-1924* (Banger, Maine: University Prints and Reprints, 1928), p. 147.

臣，也同時是滿人在蒙旗中的盟友。滿人強化明代中國的設計以控制蒙古人，主要是「將〔蒙古各〕部族分配在一定的地理區域、確認新的繼任者、賜與頭銜及榮譽、督導跨部族會議及郵政通訊、允許在固定市場有管理的貿易以及對固定朝貢者給予習慣性的禮物」。<sup>34</sup>

任何與蒙古人有關的政策均加以遵守，其根本目的在避免任何單一蒙古領袖累積權力，也因此奠下自從內外蒙古臣服清朝統治以來滿人一直能夠成功地將此二區域分離的基礎。儘管如此，如同魯朋(R. A. Rupen)所說的，雖然十七世紀蒙古人的內闕有助於滿人緩慢卻穩固地控制蒙古地方，但也顯示，專門針對內外蒙古而採用的相同政策實際上往往產生不同的結果；這基本上是因為，清朝統治者在鄰近的內蒙古比在遙遠的外蒙古更能有效地貫徹他們的意志。<sup>35</sup> 為了實際目的，內蒙古多少被視為中國「內地」。為了內蒙古行政運作的平順，這整個區域被分為6盟，包括24部，共49旗。<sup>36</sup> 有時內蒙古也被稱為「49旗之地 (the country of Forty-nine Banners)」，<sup>37</sup> 由此也可看出旗制的重要性。

雖然發展為滿洲本身行政及動員的工具，旗制這個以人口為基礎的政治軍事組織也被運用到清朝統治下的蒙古世界的每個部份。<sup>38</sup> 但值得注意的是，每當不同的蒙古群體降服於滿洲當局，「看來幾乎沒有任何困難在當中建立政府的旗制，而蒙古人對滿洲的控制不滿也從來不是因為

---

<sup>34</sup> Fairbank and others (1998)，前揭書，p. 218。

<sup>35</sup> Robert A.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64), pt-I, pp. 70-71.

<sup>36</sup> 中文的「盟」在蒙文為chulgan，中文的「部」在蒙文為aimak [aimag]，中文的「旗」在蒙文為heshun [heshuun]。參見Chang Yin-T'ang (1933)，前揭書，p. 6。

<sup>37</sup>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Mongolia*, Handbooks Prepar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Section of the Foreign Office – No. 68 (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ice, 1920), p. 16.

<sup>38</sup> David M. Farguhar, "The Origin of the Manchu's Mongolian Policy,"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204.

此制度本身」。<sup>39</sup> 在內蒙古的行政層級上，每個旗都被限在固定的地區，由世襲的札薩克統領，由旗組成部，每個部都有自己的世襲領袖。部再進一步組成盟，設有盟長，盟則直接由北京的理藩院管轄。<sup>40</sup> 雖然叫做 chulgan darga 的盟長被選出來，但他的任命及解職均須經過滿洲皇帝同意。此外，叫做「都統」的滿漢官員被任命擔任盟長的「顧問而非上司」。<sup>41</sup> 所有滿漢官員都要執行帝國政府交付他們的責任，若有任何疏失就意味著「政府的鬆散」。<sup>42</sup>

外蒙古的一個盟最多包括兩個部，但內蒙古不同，清朝大力破壞其部族組織與傳統，以致於好幾個部—有時多到 8 個—被合在一起組成一個盟。<sup>43</sup> 前面已經提到，內蒙古的 6 個盟—哲里木 (Jirim)、卓索圖 (Josotu)、昭烏達 (Juu Uda)、錫林郭勒 (Shili-yin Gool)、烏蘭察布 (Ulaanchab)、伊克昭 (Yekhe Juu)—包括 24 部，是由 49 旗組成。<sup>44</sup> 此外，內蒙古還有一些群體是不在盟的行政系統內，不受其世襲王公直接統治，例如分為左右各 4 旗的察哈爾 8 旗以及土默特和巴爾虎的蒙古人。<sup>45</sup> 一個典型的盟裡，旗是地方單位，因此不僅盟，連旗都被視為實際的行政單位。理論上，地方行政享有自治，也就是，蒙古人繼續由世襲的

---

<sup>39</sup> 同前註，pp. 204-5。

<sup>40</sup> 理藩院是滿洲行政上最重要的單一部門，負責處理不只內外蒙古、還包括內陸亞細亞地區其他滿清屬國的事務。參見 John K. Faibank and S. Y. Teng, *Ching Administration: Three Stud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130。也參見 Rossabi (1975)，前揭書，pp. 160-161。

<sup>41</sup> 關於內蒙古行政層級進一步的細節，參見 Chang Yin-T'ang (1933)，前揭書，pp. 6, 59-62；Ma Ho-t'ien, *Chinese Agents in Mongoli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49), pp. 148-51。

<sup>42</sup> Pao Chao-Hsieh,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1644-1911*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25), p. 328。

<sup>43</sup> 同前註，p. 326。

<sup>44</sup> 這些盟名的拼法依照 Christopher P. Atwood, *Young Mongols and Vigilantes in Inner Mongolia's Interregnum Decades, 1911-1931* (Leiden, Boston, Köln: E. J. Brill, 2002), p. 60。

<sup>45</sup> Sneath (2000)，前揭書，p. 9。

首領統治，但實際上，滿洲行政機關對蒙古人施加強力的影響。<sup>46</sup> 在這方面，職位須經滿洲皇帝同意的札薩克旗長更像一個屬國的君主，而非官員。此外，他有一些幕僚協助執行行政工作。

清朝治理下的內蒙古一直是北京朝廷密切監督（supervision）或說是管轄（governance）的對象。如此這般是因為中央政府有權召集會盟，並決定會盟期間討論的事務。就清朝的統治而言，這最終會影響旗級的地方行政。因此，可以不誇張地說，內蒙古多少就如同一個省般被統治。儘管如此，還是要注意，雖然內蒙古王公擁有的權力遠比外蒙古王公小，但他們從清廷獲得的待遇，尤其在朝晉期間，是非常特殊的。例如，戈壁兩邊的蒙古人必須在每年或隔年冬天前往晉見清朝皇帝，並參加在喇嘛廟舉行的典禮。<sup>47</sup> 當「那些從外蒙古來的人被安排在安定門（北京北門）外一英哩處住宿及進行買賣，而內蒙古來的人……則被安排在京城鄰近皇宮之處。」<sup>48</sup> 顯然，內蒙古的蒙古人自認和外蒙古的人比起來，他們與清廷關係更為密切。

然而，要了解上述內蒙古人的「密切」可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它有助於滿人維持內蒙古人作為其盟友；另一方面，它強化了清朝將兩地蒙古人分離的政策。如同拉鐵摩爾（O. Lattimore）所指出：「所討論的政策乃是基於一個完整的理論，相信如果蒙古人無法聯合，滿人就可以平靜地保有中國。」<sup>49</sup> 為避免此一聯合，可以用些方法協助清朝統治者獲取對方效忠，其中包括優遇內蒙古各部首長，尤其是給予各種榮銜及

---

<sup>46</sup> Chang Yin-T'ang (1933), 前揭書, p. 6。

<sup>47</sup> 同前註, p. 67。

<sup>48</sup> 同前註, pp. 67-68。

<sup>49</sup> Owen Lattimore, "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Inner Mongolian Nationalism," in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Paris: Mouton & Co., 1962), p. 442.

地方權力。另外一個方法，也是最有效確保蒙古人效忠的是蒙古人與滿人間的通婚。但是，通婚只有一種方式，主要是在蒙古王公與滿洲皇家婦女之間。滿洲阿哥很少迎娶蒙古婦女，也沒發現蒙古婦女成為皇后或嬪妃的。在任何狀況下，蒙滿之間的通婚都是被朝廷鼓勵的，而蒙漢間的通婚卻時而透過許多法令加以禁止，直至十九世紀末。

### 滿清政策轉變及對內蒙古的衝擊

剛開始，限制漢人與蒙古人混雜是滿清邊疆政策分化抗衡以確保其霸權的一部分。但到了二十世紀初，當滿人更加認同漢人中國的利益即其自身利益時，清朝統治者開始了解其邊疆政策的愚蠢。隨後，政策有了重大轉變，除了甚至取消禁止通婚的法令外，開始鼓勵漢人移居邊疆地區，包括內外蒙古。鼓勵漢人移民的政策也是為了反制當時俄國人為追求經濟繁榮而在內蒙古東部的殖民。謝寶昭(Pao Chao Hsieh譯音)說：「如果這些自殺性的領土政策〔不鼓勵漢人移民邊區〕早點改變，中國的邊疆問題會減少，而發展會更加先進。」<sup>50</sup> 在清朝垮台前來不及掃除所有的社會偏見，因為長期隔離早已在漢人與蒙古人之間製造了足夠的「誤解」與「不信任」。所以，中國必須付出代價，因為至少清朝殖民造成的後果使得外蒙古最後走向獨立。

另一方面，在政治與人口方面，內蒙古的狀況是非常不同的。政治上，內蒙古與清帝國的緊密聯繫—或說是合併—證明是永久性的，因為它持續到中國最後一個王朝結束，甚至作為一個自治區存活至今；人口

---

<sup>50</sup> Pao Chao Hsieh (1925), 前揭書, p. 341。

上，蒙古人口早被漢人移民淹沒了。<sup>51</sup> 漢人移民遍佈於內蒙古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為了增加在北方邊境的人口密度以捍衛國家、對抗俄國可能的入侵。<sup>52</sup> 從經濟上來看，這些漢人移民在內蒙古的活動不僅止於開墾草地以增加農業生產，而且透過商業活動增加收入以支持帝國政府在蒙古的行政組織。因此，漢人的經濟滲透為帝國的利益服務，進而把蒙古人「跟帝國的其他部分更緊密」連結。<sup>53</sup>

儘管如此，中國移民造成兩個蒙古社會經濟的改變，伴隨著軍事上的改變，往往被一些學者稱為「中國的殖民」。即便兩個蒙古的蒙古人在戰役中得替他們的君王服務，當內蒙古人參與活動、展現他們比傳統軍隊優異以服務滿清王朝時，外蒙古在十九世紀是與戰爭絕緣的。<sup>54</sup> 然而，同時也了解，傳統軍隊的日子已經過去，在全新狀況—亦即現代裝備革新—即將出現的情況下，他們已經沒有作用。為了對這狀況提出新的思考，拉鐵摩爾表示：

一年年過去，滿人擁有的最好軍隊已逐漸不再是滿洲旗人和蒙古徵兵，而是新式的漢人綠營，後者擁有較現代的裝備，由漢人將官率領，這種改變證實了王朝本身已然從一個統治中國的滿洲王朝轉變為本質上（雖然古老）是個「中國

---

<sup>51</sup> 參見Svat Soucek, *A History of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71.

<sup>52</sup> Rong Ma, "Changes in Loc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ir Impact on Community Life in Grasslands of Inner Mongolia, China," *China Report*, vol. 39, no. 4, 2003, p. 460.

<sup>53</sup> Joseph Fletcher, "The Heyday of the Ch'ing Order in Mongolia, Sinkiang and Tibet,"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353.

<sup>54</sup> 在十九世紀與滿人並肩作戰的內蒙古重要人物包括 1841 年鴉片戰爭中的土默特王公旺沁巴拉 (Wangchinbala) 以及科爾沁王公僧格林沁，後者在 1853-55 年對抗太平天國，1858-60 年對抗英法聯軍，1860 年對抗北京附近的盜匪，並且對抗捻匪直到他在 1865 年被殺為止。參見前註，p. 352。

### 皇帝」的中國王朝。<sup>55</sup>（粗體為後來加上）

最初的漢人移民是「季節性且獲有政府許可，但漸漸地，漢人定居下來，並從蒙古王公手中取得土地」。<sup>56</sup> 有趣的是，坐冷板凳好一陣子的中國文化光輝現在突然跑到台前，清朝統治者開始相信「中國文明必須推廣到非漢民族，這不僅為了中國本身的利益，也為了愚昧的邊疆人民的重生」。<sup>57</sup> 為了實現，每個可能的障礙都必須確實加以處理。蒙古人了解到這可能會導致同化或最終的漢化，因此懷恨在心，起而叛變。這些反叛行動的性質基本上是地區性的，而非組織嚴密的「全國性暴動」，雖然後來在 1911 年外蒙古經歷了全國性的解放運動。但在內蒙古，反對清朝統治與漢商的行動比外蒙古還發生得早，但卻沒能獲得獨立的機會。1970 年代釋放出來的一些原始資料顯示，在內蒙古發生的叛亂可追溯到 1861 年，其後在 1864、1870、1890、1899 及 1901 等年均曾發生。<sup>58</sup> 因此，正好確認了許多學者的說法，即在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期蒙古歷史的主要發展中，是內蒙古指出了道路，而外蒙古僅是跟從而已。

縱使有各種困難環繞著蒙古人，民族主義的種子已經散播，尤其是在內蒙古，憤恨更加高漲，反抗漢商的詐欺手法以及清朝統治者因為政策轉變、為了進行改革而做的各種嘗試。為了執行改革而有的行動，如同柯爾夫男爵（Baron Korff）觀察的，被蒙古人視為「干涉其地方自治」。

---

<sup>55</sup> Owen Lattimore (1955)，前揭書，p. 17。

<sup>56</sup> 隨著漢人遷移及定居在內蒙古地區，許多蒙古人開始定居、成為農人，雖然他們本質上是討厭定居生活，而清廷政策上也保留其傳統經濟。不過，這也導致社會差異的擴大，因為滿洲官員喜歡漢人移民甚於蒙古人。後來，中央政府本身也執行「殖民」政策。更多內容，參見 *A Regional Handbook on the Inner Mongolian Autonomous Region*, HRAF-60, Wash-7, New Heaven [Haven], 1956。

<sup>57</sup> Thomas E. Ewing, "Ch'ing Policies in Outer Mongolia, 1900-1911,"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14, no. 1, 1980, p. 152.

<sup>58</sup> 參見 Rossabi (1975)，前揭書，p. 212。

<sup>59</sup> 這是蒙古人在踏入二十世紀時的狀況。很快地，中國正式的殖民變得更穩定，但直到日俄戰爭（1904-05）之後的1906年清朝政府才宣佈在內蒙古實施「新政」。接著，理藩院被提升為部，改名理藩部，下設調查及編纂兩局，負責分派草地、採礦、木材、捕魚、軍事訓練與教育。<sup>60</sup> 作為「新政」的一部分，清朝官員根據調查結果設計了幾個計畫。其中一個調查是由舒親王（Prince Shu譯音）負責的，他建議「漢人在內蒙古廣泛殖民，目的是將蒙古人吸收到中國民族之中」。<sup>61</sup> 但是，這個建議被說成是對整個區域的發展計畫。

針對蒙古人的所有這些作法，其目的在使其全面漢化，這會威脅到保守、民族情感強烈的蒙古人。但是，漢化過程的衝擊並非都是負面的，從少數受過漢式教育的蒙古貴族曾向清廷提出在內蒙古進行社會經濟改變的要求一事就可明顯看出。例如，喀喇沁王公貢桑諾爾布（1871-1931）在1908年曾向清廷請願，提出八項要求：<sup>62</sup>（一）儘快開設銀行；（二）加速建設鐵路；（三）發展礦業資源；（四）發展農工商業；（五）特別照顧外交事務；（六）普及與提升教育；（七）更新軍事力量；（八）建立警察行政。就緊接在1909年，另一個科爾沁王公貢楚克色楞（Ghonchughsereng）向朝廷請願以下四項：<sup>63</sup>（一）控制宗教以停止迷信；（二）發展教育以增加人民知識；（三）訓練蒙古軍隊以加強邊防；（四）選擇耕種土地以保障人民生計。但所有要求均未獲得滿意答覆。這意味

---

<sup>59</sup> Baron S. A. Korff, "Russia in Far East,"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7, 1923, p. 277.

<sup>60</sup> Ewing (1980), 前揭書, p. 152。

<sup>61</sup> 引自Chang Yin-Tang (1933), 前揭書, p. 70。

<sup>62</sup> Sechin Jagchid, *Essays in Mongolian Studies* (Provo, Utah: David M. Kennedy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8), p. 202.

<sup>63</sup> 同前註。



著，雖然漢化多少提供蒙古貴族一個建設性思考的機會，但甚至直到統治結束，滿人都不願意鼓勵他們的建設性努力。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政策轉變後，朝廷面對的主要問題就是將旗地重組為漢式行政單位，不僅在包括滿洲地區在內的蒙古人居住區域，也包括在內陸亞細亞的清朝領地。但當時情況對皇朝統治相當不利，因為反滿反漢的情緒以許多不同方式展現。此外，當時也正是「十九世紀橫掃歐洲的民族主義浪潮現在開始到達內陸亞細亞」的時代。<sup>64</sup> 隨後，內外蒙古的蒙古人以及新疆的維吾爾與哈薩克人開始夢想建立他們「自己的民族國家」。只不過，即使在 1911 年清朝垮台之後，除了外蒙古外，沒有一個中國在內陸亞細亞的領地可以完全切斷與中國的連結。內蒙古的命運也受制於當時的環境，除了強烈力主「民族主義」或換個詞稱為「泛蒙古主義」外，沒能獲得任何類似外蒙古所得到的一即從清朝統治中獨立—這類重大的結果。

總而言之，雖然在蒙元剛剛被明朝推翻後，蒙古人就開始分裂，但蒙古分裂的程度隨著滿人的興起而強化，以致整個蒙古無法維持統一，造成地理上的明顯區分。這導致主要兩個蒙古—外蒙古與內蒙古—的出現，兩者顯著不同。當內蒙古發現自己從 1636 年起已經與中國相當密切融合時，外蒙古也由於喀爾喀王公 1691 年的投降而成為清朝的領地。內蒙古在清朝期間與中國內地的政治實體融合，甚至現今都做為一個自治區而存在。為了防範未來蒙古的統一，清朝統治者堅定地遵循分而治之的政策。此外，在二十世紀初，清朝邊疆政策的主要改變鼓勵漢人移民到內蒙古，同時也是為了反制俄國人在內蒙古東部可能的殖民。滿清統

<sup>64</sup> 將民族主義思想引入中國在內陸亞細亞的領地主要得歸功於俄英兩國。參見 Rossabi (1975)，前揭書，pp. 218-19。

治者在內外蒙古執行其統治權直至 1911 年外蒙古受中國革命影響也宣佈獨立為止。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期蒙古歷史的大多數主要發展中，是內蒙古指出了道路，而外蒙古僅是跟從而已。